

# 法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

许平

**内容提要** 从上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法国农村中农工合一的自然经济结构瓦解,乡村工业普遍衰落;传统农村的社会凝聚力丧失,农村公社解体;人口生态平衡也发生变化,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这表明原本维持传统农业社会特质的各要素都在向自我否定的方向转化,整个农业社会在这一系列解体、改造、变化的动荡之中,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的嬗变。

**关键词** 解体与改造 乡村 工业 农村公社 乡村移民 协调与稳定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法国农业走出传统、落后而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演进,法国农村也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这一社会变迁涉及农村社会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合而为一的农业和手工业发生分离,乡村工业衰落,自然经济解体;在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方面,农村公社瓦解,自成统一的农村社会被打开了;在人口生态方面,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迁移,造成新的城乡人口生态平衡,农村人口本身也随着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变化,开始向现代人转化。旧结构的解体与新结构的组合持续共存,同时并进,法国农村向现代社会迈进。

## 一

19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农村经济结构经历了普遍的显著的变化。

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纺织及其它乡村工业与小农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了农村中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稳固的经济结构,它是传统农业社会得以立足的根本。农民不仅生产生活所需的农产品,也生产绝大部分生活所需的手工业品。这种农工合一的经济结构,使农村社会自给自足,自我封闭,不仅能独立于城市之外而稳定存在,而且排斥来自城市的影响,阻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渗透。19世纪中叶,尽管工业革命已经发生,散见于法国农村各地依赖季节劳动力或业余劳动力的小工业仍大量存在。1830—1850年,阿尔萨斯、皮卡尔迪和诺曼底等地的乡村工业甚至因人口增长而有所增加。至1862年,还有100万农民在乡村小工厂里做工,平均每年做工150天。<sup>①</sup>然而,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法国工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汇成强大的冲击力量,冲击着这种小农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使农业和小工业小手工业分离,乡村工业衰落。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古老的乡村纺织业。19世纪中叶以前的乡村纺织大多以本地生长的便于加工的亚麻、大麻或羊毛为原料,织出一些质地粗糙坚固耐用的衣料解决农民的穿衣问题,其生产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家庭织妇的家内纺织,其产品大多只作使用价值来生产,

满足一家人的穿用，多余的产品才拿出去销售。另一种是农村纺织作坊或工场，从生产形式上看，较前一种更高一层，它是“脱离了一家一户的宗法式农业的第一种工业形式”<sup>②</sup>。其产品具有商品意义，多在农村市场流通。两种不同形式的生产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具有自然经济的特性，前者满足个体农民的生活需要，后者维持乡村社会总体范围的自给自足。另外，法国农村中还存在着一种“家庭加工系统”。制造商或承包商利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把生产原料，主要是纺织原料分配给一些家庭，加工后取回成品。在佛兰德、皮卡尔迪、诺曼底和里昂地区的丝织业和布列塔尼的面纱加工业都实行这种类似家庭手工业的家庭加工系统。

19世纪中叶以后，继城市里纺织机器发明使用，大型纺织厂和纺织中心的出现，大量物美价廉的纺织品，特别是价格低廉穿着舒适的棉纺织品涌入山乡，堵塞了乡村纺织业的销路，使之迅速衰落，家庭加工系统也因之衰退。“曾有数万妇女儿童织麻的地区，现在所剩无几，手工织工以乞讨为生”。<sup>③</sup>虽然偏僻地区的手工织机还在轰轰作响，但到90年代，铁路的修建使奥弗涅（Avergne）、孚日和布列塔尼等偏僻地区的乡村纺织业也受到影响。“1896年，布列塔尼仅有1万5千名织工作为过去的残余存在了”。1900年靠近罗纳河的安省（Ain）、伊泽尔（Isère）、卢瓦尔、索恩——罗纳和沃克吕兹（Vaucluse）地区的农村中，也只留有47406架手工织机。19世纪60年代，法国种有10万5千公顷亚麻，18万公顷大麻，至20世纪30年代，仅有6千公顷亚麻，而大麻种植几乎绝迹。<sup>④</sup>萨瓦的毛纺织工业曾一度兴盛，以独具特色的地方毛纺织工艺品闻名。但当铁路把进口的物美价廉的毛纺织品输入这一地区后，著名的“萨瓦呢绒”（drap de savoie）也陷入绝境，萨瓦乡村中的毛纺织业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灭顶之灾。这样，至20世纪初，法国乡村中耕与织、粟与帛发生分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家美景逐渐消失。

农村中的冶铁业和木炭烧制业也受到冲击。法国是一个森林资源丰富，但煤炭资源贫乏的国家。到1850年时，用木炭冶炼的铸铁还大大超过用煤炭冶炼的铸铁。冶金业和烧炭业分散在各地小企业中。这些小企业以当地的木材和矿石为燃料与原料，具有明显的产销都以产地为基础的特征。小型的矿场和锻炉星罗棋布于乡村中。许多农民在经营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同时，兼烧一些冶铁所需要的木炭，或者到小铁工场（厂）做工。在佩里戈尔（périgord）的一些村庄里，“每人都有矿场”<sup>⑤</sup>。在多树木的峡谷中，每隔二、三英里就有一座锻炉。40年代以后，铁路建设的需要给冶金业以新的推动，而且铁路降低了煤炭的运费，又使煤炭在冶金工业广泛使用成为可能。需求的增加和燃料的变化促使冶金业的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生产迅速集中。70年代以后，一座座大型的现代化的冶铁厂拔地而起，整个冶金业已具备一个现代工业部门的特点。乡村中的小型冶铁业再无立足之地。在上维恩省（Haut-vienne），1859年还有42座高炉，1861年仅剩8或10座了。在多尔多涅，30年代有33座鼓风炉和88个炼铁场，至1865年据官方报导，几乎所有的锻炉都已熄火，1900年这一地区已变成完全农业区了。再有克雷姆河谷（crempse）沿岸，以前布满了以水力为动力的小铁场，至1865年，64个铁场中有33个倒闭。普里瓦（privas）地区的铁矿场在1870年后也衰落，产量从1853年的14万4千吨降至1893年的4万1千吨。阿里埃日省（Ariège）早在70年代，最后一些高炉就已消声匿迹。<sup>⑥</sup>全国各地的乡村中的冶铁业都在衰落消失，即使残存下来的小高炉，面对大工厂的竞争，产量也日渐减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其它乡村中的砖瓦业、制革业、采石业和制钉业乃至酒的生产制造都在减少。伊泽尔的制钉业1875年绝迹。1901年，安纳西—阿尔贝维尔（Annecy-Albertville）铁路开通，促使阿

尔卑斯省的巴日地区 (Barges) 的钉炉倒闭。有资料表明, 七月王朝时期, 农村中家庭工业生产估计占工业总生产的6—7%, 第二帝国时降至3.7%左右, 并且还在进一步下降。<sup>⑦</sup> 19世纪最后20年, 以地方原料和市场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失去意义。

乡村手工业和小工业的衰落, 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分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乡村工业衰落意味着家庭手工业和乡村小工业同农工合一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分离。这一分离过程首先摧毁的就是农工合一共同支撑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体制中, 农民维持自身生存的一切需求都取之于农村, 即使不是由个体家庭自身生产而得, 也是在一个村庄或更大一点的地域范围内就能够得到满足。家庭手工业或乡村小工业作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补充, 维系着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存在。乡村手工业和小工业的衰落, 使自然经济的构架倒塌。它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渗透的结果, 又为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不得不到超出农村范围以外的市场上去购买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为获得购买所需货币又必须更多地向城市出卖其农产品, 这样原来城乡之间互相隔绝的藩篱被推倒, 城乡经济联系加强, 城市里的商品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推广到农村, 独立封闭的传统农村即不复存在。

其次, 乡村工业的衰落推动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移民。家庭手工业和乡村小工业都是法国农民因土地不足而必需的经济补充的重要途径, 不仅农妇以织助农、以织养农, 以实现生产者家庭的自给自足, 许多农民也在农闲时节或空余时间在乡村工厂里做工, 补充家庭收入之不足。在这一点上, 乡村工业具有双重意义, 它既维护了整个农村社会的自给, 也利于农业生产者个人的自足。据法国史学家亨利·波治 (Henri pólge) 统计, 1836年热尔省 312882名农村人口中, 有手工业者 18833名。其中包括织工、木匠、鞋匠、裁缝、泥瓦匠、铁匠、磨坊主、造车工、烧砖工人、屠夫、梳毛工、皮革匠、锁匠、马具工、榨油工、鞣皮工人、理发师等等。<sup>⑧</sup> 这些手工业者大部分不是单纯意义的手工匠, 其中许多人占有小块土地或租种土地。有些工作, 比如榨油工则完全是季节性劳动。从工匠个人看, 是兼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两种身份的生产者, 从这些工匠的门类看, 吃穿住行样样包括。直至70年代, “虽然涅夫勒 (Nièvre) 省的矿工不再租种土地, 但在上卢瓦尔省的布里乌德 (Brioude) 附近, 三分之二的矿工仍是土地所有者。”<sup>⑨</sup> 多姆山省的矿工们至19世纪末仍有人利用余暇去经营自己拥有的一份土地。这种亦农亦工, 亦工亦农, 农业和手工业在个体和总体上都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互相补偿自给自足的状态, 反映了传统农村社会中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运转的一种平衡。当城里的商品以远远高于农村产品的优势涌入农村后, 上述这种平衡被破坏。家庭手工业和乡村工业抵挡不住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而衰落, 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谋生之路被堵塞, 一些农民除了不足以为生的土地之外, 找不到其它可以替代的生活补助之途径, 从而加速了贫苦农民的破产。已经破产或濒于破产的农民别无选择, 只好离开世代相守的农村热土, 向充满新机会的城市中心迁移。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加莱海峡省向马莱矿迁移的人中, 就有17%是破产的手工业者, 78%是农村中最贫苦的短工和农民。<sup>⑩</sup>

再有, 乡村手工业和小工业的衰落利于农村中新的生产关系的生长。在农业与手工业和乡村小工业紧密结合的社会中, 整个农村社会按照区域、村庄或家庭分割成无数细小而独立的经济单位。这种互相隔绝的生产不产生分工, 不形成广泛的经济联系, 社会生产只能低水平发展。农业与手工业和小工业分离, 封闭的经济结构打开, 在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同时, 农业生产本身也因此获得新的活力。以对资本主义商品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资本为例, 在法国农业向商品化生产转化以前, 农村中的纺织业一度兴盛, 积累

了一定数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作为农业社会总积累的一部分而存在于农村。19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农业向资本主义转化急需资本，适逢农村纺织业普遍衰落，许多地区从纺织业中转移出来的资本投资于农业，促进了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如在原本农业不很发展但纺织业发达的马耶纳（Mayenne），因农业从衰落的纺织业中吸收资本，建立起商品化生产的农场，而使该省跻身于农业发达地区的行列。<sup>⑩</sup>朗格多克地区的葡萄园在葡萄根瘤蚜虫害以前，就已经在吸收从纺织业中转移出来的资本。葡萄虫害过后，南部许多地区重建葡萄园，需大量资金，每公顷约2000法郎，大的投资者的资金也有相当部分是从衰落的纺织业中转移而来。<sup>⑪</sup>大笔投资推动了葡萄种植向集中方向发展，出现使用现代技术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葡萄园和葡萄酒制造工厂。这样原来乡村纺织业的资金变成了农业资本主义增长的资本。

乡村工业的衰落既反映了旧的经济结构的分解，也推动了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化。在分解分化的同时，建立起新的经济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增长。

## 二

农村公社是传统农业社会构成的细胞，整个社会肌体的变化必然在细胞的变异分化上得到反映。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法国的乡村人口大部分生活在受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限制，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农村公社里。农村公社中有集体共同所有的公有土地、森林、牧场、未开垦的土地及矮灌木丛等。这些被视为公社的集体财产。此外，公社还保留了每个农民都可在休耕的土地上、已收割的田地中和第一次割草后的草场上放牧牲畜，捡拾麦穗和柴草的权利，这些被称为集体权利。公社的集体财产及这些公社的集体权利构成了公社存在的基础。此外，公社内还有各种集体约束，即使为个人所有但在公社地域范围内的土地，也受制于公社各种规定的限制，包括耕种法则、强制轮作，公共牧场和收获时间等等，尤其受制于公社居民集团的集体约束。集体的约束力主要来自习惯和传统。

农村公社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与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新型社区比较，农村公社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农村公社中经济活动简单，公社成员或在平畴万里的平原地区从事种植业，或在草木茂盛的高原地带放牧牲畜，在这些生产活动中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不依赖市场。乡邻之间的生产活动相似，彼此没有更多的经济联系。二是地域界限较清晰。农村公社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总有一定的区域界限。公社的外沿是根据该公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对周围地区的影响而自然形成，由于自给自足的农民的生活范围不超过方圆十几里，与外界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很少，因而传统农村公社的地域界限十分明显。三是公社内的社会结构简单。以家庭为收支单位的传统农业生产活动，所得和支出在家庭内分配，不存在社会分工和更多的社会联系。因此造成公社内的社会结构简单，基本上只有两大阶级或阶层土地所有者和耕种土地的农民，另有一些手工业者等附属人员。四是血缘关系和地域观念浓厚。由于家庭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又由于公社居民的社会交往活动范围十分狭窄，多限于公社内部，因而在人们的思想中有强烈的血缘观念、地域观念和公社集团的认同感。公社成员的行为方式、道德准则、生活习惯乃至语言也依公社内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传统标准和公社成员的认可而界定。甚至“相邻的村庄里的房屋、家俱和生产工具都不尽相同”<sup>⑫</sup>。这种情况有助于公社保留自己的特性，自成天地，造成一种公社就是社会整体的感觉，加强了公社对其他成员的凝聚

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的变革,原本构成坚固而延续千百年的农村公社社会共同体也发生深刻的变化。与外部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加强,使公社自成一统的地理界限逐渐模糊;文化教育及城市社会影响的增长,使地方文化和习俗逐渐失去吸引力,地域观念也随之淡薄;农民新的经济活动的增长又使得公社内社会结构变得复杂。在一系列变化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大革命前就因经济发展而受到冲击的公社公有土地和集体权益进一步减少,它使得农村公社共同体失去存在的基础。

公有地(Common land)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集体占有土地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共耕共有的土地制度与资本主义个人占有财产的原则相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成长的障碍,在法国大革命中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1792年8月14日吉仑特派促使议会通过法令,规定除林地外分配所有公有土地。1793年6月,雅各宾派又通过一个关于公社公有土地的法令,规定公社内的公有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至于是否分配,由25岁以上的公社成员表决,有三分之二的人投票赞成即可分配。由于这项法令对是否分配公有地有所保留,使得法令在执行过程中各地情况不同。1792—1795年,北部相当多的地区在公社权力机构的主持下,在农民中分割或出售了公有地。大城市附近地区的公有地几乎全部消失。但在法国西部、南部和中部情况有所不同。吉仑特省,在52个有公有土地的村庄中,37个村社拒绝分公有土地。在歇尔省,106个有公有土地的村社中,73个村社不想分公有土地,而且这种决定差不多是一致通过的,33个村社虽投了票,但大部分皆未付诸实施。<sup>④</sup>公有土地的分配在各地区各阶层人中争议颇大,1795年法令规定,公有地暂停分配。1803年执政府中止了公有土地的分配,但承认已分配或出售的公有地。

尽管如此,公有地的分配还是取得显著成绩。“1815年约十分之一的法国保留了公共所有权,但这一数字不能代表纯粹农业地区的状况。大部分法国的公有地存在于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孚日和汝拉的林地和高原草场上,北部和西部的公有地几乎绝迹。”<sup>⑤</sup>与公有地不同,农村公社的林地牧场大部分得到保留。

大革命对公共放牧权(droit de parcours)的触及不多。虽然1792年议会法案规定由农民自己决定保存或取消公共放牧权,但因公共放牧权对贫苦农民来说至关重要,遭到普遍反对,只有个别地区取消。整个19世纪,许多地区的公共放牧权依然存在。1892年议会通过法令,经农村公社农民同意才能废止公共放牧权。1899年公共放牧权和公共牧场才被从法律上取消。1914年左右,在收获后的土地上的拾穗权也被禁止。<sup>⑥</sup>

大革命以后,公有土地和公共权利的削弱过程仍在继续。在这一过程中,大革命所确立的土地耕种自由的原则起到不容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农村,农民耕种土地受到来自公社的集体约束,包括强制轮作,公共牧场,甚至连耕种农作物的种类时间也受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限制。这些限制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的色彩,其目的在于让耕种者按照一定陈规使用土地,以便于在休耕之时或收获之后把个人所有的土地向全体公社成员开放,辟为公共牧场,使大家受益。如法国研究农村史的专家布洛赫所生动描述的,一旦收割完毕,土地所有者的所有权就开始“休息”。这种作法显然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限制,对个人利益的一种侵犯。1791年9月,制宪议会通过法令,规定每个土地所有者都可按其意愿自由耕种土地。此举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是对公社集体约束公社集体权利的一种否认,它扩大了个人财产权利。虽然法案颁布后的第一代农民还往往像其父辈一样经营土地,但从此打开了变化之

窗。自由耕种促进了新品种的引进、新农艺的实施和耕种方法的改进。全公社一致的两圃轮作被破坏，休耕地逐渐减少。19世纪初休耕地还占耕地的三分之一，1840年降至不足四分之一，1852年是五分之一，1882年仅剩七分之一，1840—1882年休耕地减少了46%。<sup>⑭</sup>休耕的空地减少，加之公社里连成一片的相邻的土地上种植作物不同，收获时间不一，难于实行公共放牧，公共放牧权就自然而然地受到抑制。在许多地区，公社成员共同把收获后的耕地辟为牧场的陈旧习俗，在这种农业耕种的变革中逐渐走向灭亡。

此外，许多地区因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圈围土地增多，开垦荒地增多，公社所有的荒原旷野被一块块蚕食或被分掉。1880年左右，上科雷兹的公有地被分掉。<sup>⑮</sup>还有的地方以出卖公有地来支付地方公路、学校和其它地方设施所需费用。<sup>⑯</sup>生产工具改革，大镰刀取代小镰刀，收割机取代镰刀，使收割后残留的谷秆变短，也是对集体放牧权的一种破坏。

法国史学家阿·索布尔教授写道：“大革命以后农村公社的发展以两种经济形态和两个社会阶级之间的不明朗但激烈的斗争为特征。”<sup>⑰</sup>这里所说的两种经济形态的斗争就是指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农村公社集体权利所维护的自然经济之间的斗争。对农民土地所有权有所限制的村社权利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法国农村中的发展，却是少地无地农民的生活依靠。整个19世纪，少地无地农民为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公社权利而努力。这种努力在1830和1848年农村里的骚动中得到充分体现。1849年5月埃罗省的塞尔黑（Ceilhes）地区的农民强迫1816年公有地出售的获得者退回土地。1848年6月27—28两日，奥德省孔克（Conques）地区的农民甚至要求重新使用短柄镰刀。<sup>⑱</sup>1848—1851年间，这种要求恢复对公有地的使用权和其它公社权利的农民骚动遍于东南、西南和中部各省，在北部资本主义化程度较高地区却很少出现。这些骚动代表了尚未转化的农民——这一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也反映了已延续千百年的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和公共权利正在经受资本主义化的冲击，江河日下，日渐减少，以至于使得依赖于它的贫苦农民不得不奋起为维护它的存在而斗争。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如索布尔所述：“当农业纳入资本主义轨道之时，农村公社和自然经济形态经过一个世纪的抵抗后，终因彻底分解而告结束。”<sup>⑲</sup>由于缺少统计资料，无法表述这一变化在各地的发展程度。根据所接触的材料，只能阐述这样一个事实，整个19世纪法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地和集体权益一直在减少和削弱，“19世纪下半叶农村公社的退化加速”<sup>⑳</sup>。总的看来，北部农业先进地区变化速度快，至19世纪中叶，公有地和集体使用权利就已消失，中部、西部和南部落后地区的变化相对缓慢。公有地和集体权益虽然受到严重削弱但还继续存在，至20世纪中叶现代农业体制确立才消失殆尽。

公有地和集体权益是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它的存在使农村公社能够按照传统农业社会沿袭下来的经济平等的原则，一方面限制富有者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贫苦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由此支撑着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维系着人人都有口饭吃，但不一定人人都能吃饱的传统农业社会。公有地和集体权益的丧失，不仅意味着公社为农民提供的可以依赖的经济条件的减少，也意味着农业社会平均主义的经济准则的破坏和公社集体约束力的削弱。当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把一部分人引上富裕之路，同时把另一部分人抛向破产的困境时，公社再无力缓和和逆转这一趋势，公社的社会调节作用失灵，公社再不能像以往一样凝聚农民。破产的农民只好背井离乡流向城市，农村公社趋向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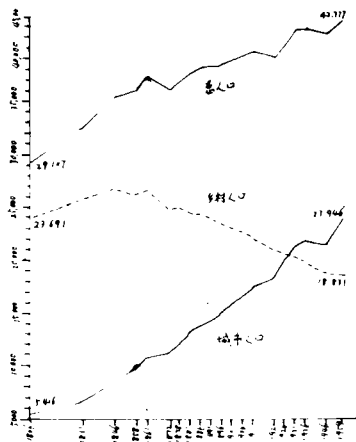
### 三

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转移，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的重要一环，它反映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变化的深刻过程。

19世纪中叶，法国交通革命和工业化的深入进行，使迅速膨胀的城市成为一个个强大的磁场，刺激与吸引着农民走出长期蜗居的穷乡僻壤，而农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及乡村工业的衰落，使农村中的一些小农和手工业者破产，农村中的剩余人口增多，在这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50—60年代法国出现大规模乡村移民。

有资料表明，1841—1851年法国农村移民数量比前十年增加近一倍，由47万3千增至84万9千人，1851—1861年比1831—1841年移民人数增加近两倍，达到126万5千人。此后的移民规模再没有少于每十年85万人。<sup>④</sup>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通过图表统计表述城乡人口的变化：<sup>⑤</sup>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法国的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50年代以前都在增长，这表明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大于移民流出。50年代后，农村人口直线下降，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说明农村人口以超自然增长率的速度涌入城市。据统计，1861—1891年人口自然增长只能补偿移民流出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sup>⑥</sup>尽管这一速度低于英国同期水平，但它表明，法国的人口结构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法国人口城市化时代来临。



农村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对法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在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的同时减轻了农村的人口压力。19世纪50年代以前，法国农村人口一直呈增长势头。农村人口越多，土地压力就越大，土地也因此越分越小，这意味着生产力发展的余地越来越小。在这种重压下，农村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几乎成了僵板一块，任何革新和变化都要受到人口压力的掣肘。减轻农村人口压力，实现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已成为农业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既然由于历史原因，法国没有出现英国圈地运动那样的大扫荡，那么这一任务只能由持续的人口迁移来完成。从50年代起，法国农村人口开始减少。据法国统计局统计，1861—1891年法国乡村人口减少380万；据莱维·勒布瓦耶统计，同期乡村人口减少490万。<sup>⑦</sup>1875年以后迁移速度加快。1876年乡村人口为总人口的67.6%，1886年为64.1%，1896年为60.9%，1906年为57.9%，1911年为55.9%。<sup>⑧</sup>农村这块僵硬的板块开始松动，为新的变化提供了可能。19世纪下半叶，法国土地占有结构上的再分割趋势的减弱和土地集中现象的出现就与农村人口减少有密切关系。因为大量农村人口走出农村，必然使遗留在土地上的人有多于以前的生存空间，使之有可能扩大其土地。人口压力的减少，又致使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了资本向劳动工具转移。1851—1857年和1873—1887年农业资本投入增长34%—41%，<sup>⑨</sup>资本的投入带动农业机械的传播，法国农业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活力。

此外，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不仅给农民提供了一个从家庭责任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农村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契机，促进了城乡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它对禁锢农民的传统观念小农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新式移民不再是旧式小农思想的因袭者，而是城市观念的携带者。移民的影响在农村中迅速传播。返回故里的劳动者不仅告诉其同胞前所未闻的城里面的事情，他们还穿回了新衣着，带回了新的生产方式，甚至把骑回的自行车向乡亲们展示。这一切都深深影响刺激着山乡居民。

移民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政治觉悟的提高。最初的移民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好在城里做工作艰苦、报酬又低的工作。当他们目睹了读书写字在工作中的用处后，就极力希望其子女读书。1882年多姆山省的昂贝特地区，入伍新兵中文盲很少，当地学校校长解释为“移民影响的结果”。1870年康塔尔省的一个偏僻山区还乡移民以“人民保卫者”的名义出现，向乡亲们宣传城市里的斗争和激进的思想。伴随着移民的成长，阶级的和民族的意识都在觉醒和提高。

与其它国家相比，法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距离短、规模小、速度慢、持续时间长。这些特点给法国历史的发展留下深深的痕迹。城市吸收能力不强，农村人口短距离移民，必然使得大城市大矿山及铁路干线附近地区与偏远地区分化极不同步。靠近主要城市的农村，50—60年代移民就已充分发展，而贫穷的高原地区及远离竞争压力、缺少现代经济吸引的边远地区，当时还基本是未触动的真空地带。进入20世纪以后才受到影响，缓慢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这种非同一水平的分化结果势必使法国城市和边远地区出现距离空间，城市不能带动整个农村，农村拖城市的后腿，增加了变革的阻力。此外，农村人口迁移缓慢必然影响农村社会的分化。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过程在法国持续得特别长，大革命确立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在法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随后是缓慢分化，直至二战后的第五共和国才在政府的干预下促成大量小农破产，建立起期待已久的资本主义农业体系，旧结构的分化和新结构的整合才最终完成。

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人口生态之间都要互相适应、互相协调，正是这种适应性和协调性，构成了每一社会存在的内在根据，构成了每一社会内在的凝聚力。本文所论述的，由乡村工业衰落而表明的农工合一的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以农村公社解体而体现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细胞的分裂，因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转移而代表的旧的人口生态平衡的破坏，这一系列变化过程无疑都在证明，传统社会各系统功能耦合的协调性已经破坏，社会内部因各系统协调而产生的凝聚力已经丧失，自给自足的独立存在的传统农业社会正在“礼崩乐坏”。整个农业社会正在进行新的分化与组合，大革命以后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农民所有制的社会终于从相对的静止稳定走向变化动荡，以寻找和实现新的协调与稳定。毋庸置疑，本文所涉及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法国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时期。变化的特征是先缓后急，80—90年代以后变化频率才逐渐加快，以加速度向前发展。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变化与稳定共存，现代与传统并存。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慢于经济的变化，偏僻山区的变化慢于平原地区的变化，中部和南部的变化慢于北部地区的变化，小农的变化慢于大中农的变化。尽管如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的农村已经完全不同了1815年的农村社会了。“农村世界失去了其独立性，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越来越依赖于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迅速发展的城镇”<sup>⑩</sup>，法国农村历史的新一页已经翻开。



注: ①⑦ F·布罗代尔、E·拉布鲁斯《法国经济社会史》(F·Braudel、E·Labrousse,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France) 巴黎, 1976年版, 三卷下册第746页、6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卷, 第293—294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 尤金·韦伯《农民变成法国人》(Eugen·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伦敦, 1979年版, 第212页、212页、214页、214页、212页、223页、213页。

⑩⑬⑳ 罗格·普赖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史》(Roger·Price, A Social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伦敦, 1987年版, 第89页、174页、196页。

⑪⑫㉑ 罗格·普赖斯《法国乡村现代化》(Roger·Pric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伦敦, 1983年版, 第364页、374页、361页。

⑬ 孙桐《试论彻底与妥协》, 载《世界历史》, 1989年第3期, 第49页。

⑮⑳ J.H.克拉潘《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发展, 1815—1914》(J.H.clapha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伦敦, 1968年版, 第12页、159页。

⑯⑰⑱ 尤金·韦伯《农民变成法国人》, 第129页、120页、128页。

㉑㉒㉓ 阿·索布尔《法国农村公社, 十八—十九世纪》(Albert·Soboul, La communauté Rural Française, XVIII<sup>e</sup>-XIX<sup>e</sup> Siècles), 载《思想》(La Pensée), 1957年第73期, 第79—80页, 80—81页。

㉔㉕㉖ 弗朗索瓦·卡隆《十九至二十世纪法国经济史》(Francois Caron, 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 XIX<sup>e</sup>-XX<sup>e</sup> siècles) 巴黎, 1981年, 第110页、110页、109页。

㉗ F·布罗代尔《法兰西特性》(F·Braudel, Identite de la France), 巴黎, 1986年版, 三卷, 第186页。

(作者单位 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 华祝)

(上接第9页)

不时困扰着我们党, 危害我们的事业。在这方面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是很多的, 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因而, 反对片面性、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提倡全面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仍然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小平同志在新时期大力提倡要经常总结经验, 这对于党的思想建设也将有深远影响, 因为总结经验过程也是深入实际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调查研究过程; 而片面性、绝对化思想方法的劣根性在于脱离实际, 或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 所以坚持用实践标准检验工作、总结工作, 则是克服这种劣根性的一剂良药。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环境, 我们要善于抓住机遇, 发展自己。有机遇不抓, 将铸成大错; 而抓而不善, 也等于不抓。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气魄, 紧紧把握这一历史机遇, 加快发展自己, 同时又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特别是在取得很大成绩面前, 他经常提醒我们“要保持谦逊态度”, “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 “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这正是他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 我们深信, 真正循着这样的思想路线发展下去, 就一定能够达到既定的目标, 也一定能够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活力。在上个世纪行将结束(1895)的时候, 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曾写道: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的思想家, 也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更好地运用这个科学的世界观, 勇于实践并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 写出新的著作, 新的文章。我们深信, 到那时, 中国将会以更加高扬的社会主义旗帜和更加辉煌的成绩, 迎接新的世纪更加绚丽多采画卷的展开。

(作者 北京大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 龚言)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Without the study of how man is regarded as man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xposition on ma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make a successful study of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China. Taking the study on Confucius' exposition on man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of the essay retorts the arguments found in Mr. Xu Fuguan's *A History of Chinese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and puts forth his own perspectives. He finds out the real basis for Confucius' thoughts and his exposition on man,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studying Chinese exposition on man.

#### **Small Scale Farming System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by Dong Zhenghua*

Since the 1950s, the regime in Taiwan as well as in South Korea has adopted a new kind of small scale farming system based on the idea of "land to the till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ystem is the farmer's limited land ownership, which enables small farmers to uphold their farmland and makes it easy for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control the rural socie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system,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allies itself with the farmers. The immediate result of this alliance and domination is the rural stability, and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eriod, the small farmers raise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by the application of low priced family labor and "neutral-scale" technology with the help of the state. Without the landlord in between, the state has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farmers, "squeezing" more from the agricultural section to ensure industrial growth by some administration mechanisms instead of through the market force. The vitality of contemporary small scale farming system not only challenges the classical agricultural theories, but also shows a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East Asian pattern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un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s.

#### **Disintegr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French Rural Society from Mid 19th-Century to Early 20th-Century**

*by Xu Ping*

From the last half of the 19th-Century, the French rural society underwent many radical changes. The rural industries declined, the natural economic structure disintegrated, the rural communes also disintegrated, which showed the weakening of the attra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moved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ities, resulting in a radical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However, it was through this disinteg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urbulent move of population that the whole rural society completed the historical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into a modernized one,